

# 二十一世紀評論

## 全球視野中的伊斯蘭文明

### 殉道者的新形式

- 霍斯羅哈瓦爾  
(Farhad Khosrokhavar)



殉道是什葉派這個只佔真主總信徒1/6的穆斯林少數派別的核心現象。與什葉派傳統的、只屬於幾位被命運選中的聖人及其近從的殉道觀念相反，現代殉道者將殉道視為對抗種種強勢的惡而必須達成的具體業績。殉道不再是少數精英自我建構的武器，而是相當大一部分年輕人的特徵。

「九一一」事件向我們展示了激進伊斯蘭主義的一個側面，那就是有意識地以犧牲眾多無辜者的生命來達成恐怖。這種殉道 (shahid) 結合另一個伊斯蘭原初的觀念——聖戰 (dijihad)，通過最近對世貿大樓的攻擊，向我們顯示了其爆炸性的特點。

我們知道，殉道是什葉派這個只佔真主 (Allah) 總信徒1/6的穆斯林少數派別的核心現象。無論是在反抗沙赫國王政體的鬥爭，抑或是在對伊拉克長達八年 (1980-88) 的戰爭中，伊朗伊斯蘭革命都曾以殉道的名義動員過伊朗的年輕

人。與什葉派不同，殉道在遜尼派的宗教意識中並不扮演根本性的角色。這樣一種從教理角度看是邊緣化的觀念，卻沒有妨礙阿爾及利亞、巴勒斯坦、埃及、阿富汗或阿拉伯半島等地的遜尼派信徒在最近20年中以此名義反抗現存政治制度，或是對抗美國、法國敵人。這顯示了這兩個伊斯蘭主要教派觀念之間的界限流動性，尤其是遜尼派為其需要而吸收什葉派觀念，並掩飾這種借用的能力。與什葉派傳統的、只屬於幾位被命運選中的聖人及其近從 (伊斯蘭教長和他們的伴從) 的殉道觀念相反，現代殉道者將殉道視為一種對抗種種強勢的惡而必須達成的具體業績。與穆斯林社會的現代化相聯，殉道不再是少數精英自我建構的武器，而是相當大一部分年輕人的特徵。對這些新的神聖死亡候選人來說，最嚴重的莫過於感覺到無法體面地生活在這個由惡的強勢所統治的世界

裏。他們唯一的出路就在於將自我歸於死亡，當然，也包括毀滅那些與惡勢力同謀的事物，以便加速時間終點 (la fin des temps) 和世界末日 (l'Apocalypse) 的實現。這些「新殉道者」與其虛構出來的穆斯林社群認同，而與同樣是虛幻的異教社群對壘。他們並不是從抽象的神學來定義自我的宗教身份，而是從自我身處的具體經驗世界出發來自我定義。在這個世界裏，舊有的和諧一致崩頹了，而新的、正在出現的社會則是極不公正的。

這些新的殉道者大致可以分為兩類。首先，是那些沒有傳承、被排斥在現代性好處之外的青年所需要的殉道，雖然他們生活的周圍世界卻可能是充滿幻想的。總的來看，遭到社會排斥並不能導致殉教，一定還要另外兩個因素：一是屈辱，在日常生活中尊嚴被否認；二是社會框架，社會保護和社群幫助機制的深層解體。只要傳統的社群機制還能運行，足以保護其成員抵禦那在悲劇性的自我喪失中的個體化感覺，那麼作為「活人炸彈」的殉道邏輯就是不可能的。這就是為甚麼那些老一輩的巴勒斯坦人很少有這種殉道行為的原因。今日年輕的巴勒斯坦人具有很強的個體自我意識，然而其處身的具體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卻堵塞了他們建構自我 (soi) 的途徑：他們生活在那些以色列移民擁有對水和其他消費好處幾乎無限的使用權的地方 (對巴勒斯坦年輕人來講，這些東西即使有也十分有限)，以色列人擁有財富和表現自我的不同方式；但對巴勒斯坦年輕人來講，他們經常處在以色列軍隊的屈辱下 (既在象徵層面，也在那些搜身、毆打、宵禁甚至酷刑等具體事情上)。既生活在解體、沒能力藉積極自我宣泄來達至自我解放的社群中，又被拋棄在消極的、退化到只剩純粹剝奪感的這樣一種個體性中，這些年輕人在苦修禁欲的伊斯蘭主義 (islamisme) 中找到拯救的情感。這種以真主名義的伊斯蘭主義給予他們一種彼此團結的感覺 (在現實生活中卻四分五裂) 和在其他那些被屈辱壓垮了的同胞眼中看上去表現的一致性，他們成為那些他們以神話方式重構的、想像的、和諧統一的、受真主保護的當地社群的當地民眾眼中的英雄。雖然美國人和以色列人在技術和軍事上有絕對優勢，但他們仍向美國人尤其是以色列人炫耀由他們造成的恐懼所獲得的尊嚴。在這裏，殉道表現為對尊嚴受屈辱，對個體性 (individualité) 被否定和卑微地位象徵的反應，而這種反應通過死亡把所有這些問題加以反轉。殉教來自對絕望的神聖化，以重新構造的宗教理想的名義導入一種世界末日的意涵。由在以色列人、同時也在這些殉道候選人自己眼中的低等狀態，他們藉着給以色列人造成的恐懼，並以信仰戰士的宣示驕傲地成為「高等」，在作出決定命運、通向神聖死亡的抉擇前，翻轉了不斷貶低、凌辱他們到低級、無尊嚴狀態的邏輯。這種以拯救方式出現的神聖死亡，讓他找回喪失的榮譽。我們或可將殉道者這種以殉道者的激進恐怖主義，同時也是恐怖宗教意識的行為，稱之為「病理殉道」(martyr pathé) 的，它同時揭示巴勒斯坦自治權力機構的不合法性、腐敗和專制，其對民主化和巴勒斯坦社會對把握自身命運的參與的壓制，窒礙了健康正常的政治看法的形成。

除這種殉道者之外，還存在另一種的殉道。這裏，是在西方內部展開的悲劇。絕大多數移居西方的穆斯林融入其所在的社會並與當地的生活方式結合，

雖然美國人和以色列人在技術和軍事上有絕對優勢，但殉道候選人仍向美國人尤其是以色列人炫耀由他們造成的恐懼所獲得的尊嚴。在這裏，殉道表現為對尊嚴受屈辱，對個體性被否定和卑微地位象徵的反應，而這種反應通過死亡把所有這些問題加以反轉。殉教來自對絕望的神聖化。這種以拯救方式出現的神聖死亡，讓殉道者找回喪失的榮譽。

極少數與所在社會疏離，念念於其身份認同的憂慮，並與大多數穆斯林區別。這微小的群體被一種受傲慢的超級強權在政治和文化統治的感覺所支配，而這超級強權還佔據伊斯蘭的聖地（美國自海灣戰爭起在沙特阿拉伯駐軍），並支持那些與穆斯林衝突的霸權（具體表現在以巴衝突中對以色列的支持上）。那些駕機撞毀世貿大樓的駕駛員就是屬於這個中產階級。他們長期居住在西方超現代的社會中，產生強烈的對抗意識，並被恐怖份子網絡所吸收。我們經常強調這種政治—宗教活動網絡的國際性，但卻往往忽略探討那些決定此類前所未聞的自我遺棄和盲從的自殺行為所需要的主體因素。當這些人依然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有着一種混雜着輕微的現代主義的自我身份認同，這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的。只是當他離開本國來到西方，事情才開始變得複雜。面對一個曾被這些人讚美但現在看來卻是失禮、不正派、甚或是懷有敵意的世界，他們以一種角鬥的形式西方化，這深深地觸及到他們的身份認同問題。他們在對抗粗野的西方的激情中形成極端尖刻的意識，並以一種特殊的形式政治化、西方化。他們自視為穆斯林控訴西方的冷漠甚至敵視的不幸意識的發言人。這裏缺少不了一種單向的、對西方偽善的指控，卻不去指出這些身患惡疾的穆斯林社會自身應負的責任。在這種背景下，伊斯蘭教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或激進的第三世界主義所扮演的角色相差無幾。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今日的西方普遍處在一個社會和文化大方向都不確定的時期，在價值上顯得如此內傾。如果沒有這些在西方內部現代化和激進化了的極少數穆斯林團夥對西方的深深仇恨，從而扮演信仰鬥士的角色，那麼無法理解這些年輕人為甚麼會投身像本拉登 (Osama bin Laden) 組織的現象。這些激進穆斯林對西方的誤解，還夾雜着一種他們無法寬宥的、對西方蔑視的情緒。他們依然將西方世界想像為鐵板一塊，一個依其魔性而統一在一起的世界，並將西方的分裂倒置到西方特有的意識中。越是在這部分世界的個人間顯現出一種分裂和疏離，那些激進的穆斯林便越是將其視為像魔鬼般協調的對抗伊斯蘭教的整體，而不管其中存在着的、讓人驚訝的文化、政治和社會表現形式上的差異。從它那一方，現代媒體使這種情況惡化。它們在具體效果上是以一淡化了的方式展示着伊斯蘭世界的不幸困境並顯現出它們對伊斯蘭世界的不了解。當電視一方面不斷播放巴勒斯坦無名死者的場景，另一方面卻又強化、個人化、悲劇化了以色列人的死亡，我們可想像這些畫面對焦躁不安的伊斯蘭鬥士的影響；還有，人們可以回想海灣戰爭時期媒體對伊拉克的妖魔化，然而在兩伊戰爭期間，卻把伊拉克塑造成良好善意的形象……由於西方媒體對穆斯林的的特殊性只有粗淺的了解，從而將之作騎士式的處理，再加上一種蔓延的反伊斯蘭的種族主義，都加強了這些現代化小團體的激進傾向。它們指責西方沒有兌現正義和自由的理想，起而反抗這個腐蝕和誘惑人的文明；而且，這文明現在又陰險地想從內部侵蝕那些最神聖的、曾給予以往伊斯蘭社群存在意義的種種價值規範，如性、酒的消費等方面的禁忌來毀滅穆斯林社會。這些西方化的穆斯林以角鬥士的姿態，大大地將他們原先成長的伊斯蘭社群神話化為具有黃金時代 (Age d'or) 的純潔性和統一性。同樣，他們

那些駕機撞毀世貿大樓的駕駛員，自視為穆斯林控訴西方的冷漠甚至敵視的不幸意識的發言人，缺少不了一種單向的、對西方偽善的指控，卻不去指出這些身患惡疾的穆斯林社會自身應負的責任。由於西方媒體對穆斯林的的特殊性只有粗淺的了解，再加上一種蔓延的反伊斯蘭的種族主義，都加強了這些現代化小團體的激進傾向。

也過度高估了西方社會自私自利的程度及其意識明確地以腐敗摧毀伊斯蘭的願望。他們對西方有一個頑固纏繞的情結，表現在激烈排拒既是誘惑者又是腐蝕者的魔鬼般的西方上，同時對一種純潔性的宗教念頭的縈繞上。事實上，對這些新的聖戰狂熱份子來講，每個西方人都參與了顛覆、摧毀伊斯蘭教基石的陰謀工作。這就說明了對抗西方人的全面絕對的戰爭（像襲擊紐約世貿大樓那種毫不區分有罪者和無辜者的行為），會成為他們的宗教義務。沒有人是嚴格意義上的無辜者，因為所有人都是造成這種魔鬼的不純潔的罪犯。西方世界的每個個人的特徵，消失在他所屬的神秘化的惡的社群的圖像後面。

伊斯蘭激進份子的集合網絡像現代秘密邪教那樣運作（歐洲的太陽神廟 [Temple Solaire]、日本的奧姆真理教或是美國的大衛教派）。在這些封閉的集合內部，自我宣示是靠排斥那些被視為社群種種惡的根源的他者 (l'Autre) 而達成的。這社群是一種純粹的、單一的神秘事物，沒有領土也沒有歷史的統一內核，只建諸角鬥的救世學說之上，從教義上講它只在自我毀滅和對他者的毀滅中實現。奇里瑪斯型的領袖是極端的戰爭邏輯的承擔者，他在死亡中統一這個社群。殉道式的死亡成為這個「受難社群」的頂峰，對這個社群來講，自我的死亡和他者的死亡是唯一要向這個腐爛的世界傳達的資訊。事實上，不管本拉登是否想摧毀這個用他的無往不勝的邏輯來看是個有着阿喀琉斯之踵的美國，這毫不改變他的追隨者對死亡的癡迷，這種癡迷是這些信徒對在這個他們認為已被惡勢力佔據的世界中感到的自我喪失的另一側面。

考慮到他們的主體性問題，這些新的信仰鬥士就不是甚麼伊斯蘭文明投向西方宣戰的鐵矛。就大部分來講，他們是世界上不平衡的西方化，對信仰的純粹性和統一性的冥頑癡迷的一種結果，他們猛烈地在死亡中追求統一，也因此他們不是生命邏輯也就是文明邏輯的承擔者。按他們的願望所召喚的世界不是一個文明對抗另一個文明的世界，而是死亡對抗生命的世界。與存在在西方自身內部的那些封閉和死亡性的邪教類似，他們想在矛盾的西方化過程中藉由死亡達至純潔。

張倫 譯

伊斯蘭激進份子的集合網絡像現代秘密邪教那樣運作。這種社群沒有歷史的統一內核，只建諸角鬥的救世學說之上。從教義上講，它只在自我毀滅和對他者的毀滅中實現。殉道式的自我的死亡和他者的死亡是唯一要向這個腐爛的世界傳達的資訊。但他們不是生命邏輯也就是文明邏輯的承擔者，而是死亡對抗生命的世界。

**霍斯羅哈瓦爾 (Farhad Khosrokhavar)** 原籍伊朗，早年在法國學習，獲多種哲學、數學學位，後歸伊朗進行教學、研究工作。伊朗革命後，80年代中再到法國。哲學博士論文研究海德格，後又習社會學，以對伊朗革命的研究獲社會學博士學位，法國國家博士學位。對伊朗革命和兩伊戰爭期間殉道現象有出色研究。現為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指導教授，當代伊斯蘭問題專家。著有《伊斯蘭主義與死亡：在伊朗的革命殉道》(*L'islamisme et la mort: le martyre révolutionnaire en Iran*)、《伊朗：怎樣走出一個宗教革命？》(*Iran: Comment sortir d'une révolution religieuse*)、《神聖的訴求：社會科學基礎的思考》(*L'instance du sacré: Essai de fondation des sciences sociales*) 等個人或與人合作的社會學、哲學著作多種。